

新会文史资料选辑
· 第十一辑 ·

非卖品 请交校

新会县政协文史组编印

封面设计 黄 蕾

一九八三年七月

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目录

从“学务公所”到第一间学堂

——求志学堂……………李子韶（1）

伍廷芳与廷芳义塾…………李汉振、何卓坚（9）

新会景堂图书馆概况

……………景堂图书馆供稿（14）

我怎样当上国民党新会县党部特派员

……………李淞甫（17）

新会县长马有为失印记

……………园林处李寿祺（25）

我所知道的汤鹤华……………伍辉（28）

抗日战争期间新会的领导宣传、动员机

构……………朝练、赵绍法（33）

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的前前后后

情况的回忆（三）……………谢悦（41）

我县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矛盾及

其合并的回忆……………林瑞尧（48）

回忆《新会战报》……………伦海滨（52）

苏世平先生及其医学成就……………方思泽（57）

李雁南烈士生平简介……………何东成（61）

新宁铁路跨海路线为何舍近求远

……………黄伦（62）

从“学务公所”到新会第一间学堂

——求志学堂

李子韶

(一)

清光绪二十二年（公元1898年）梁启超发表《变法通议》，朝野震动，有识之士都主张废科举，兴学堂。这就是当时的所谓新政之一。至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清朝被迫公布《钦定学堂章程》，及壬寅学制图。这些章程对于当时初级学堂的设立、学级的编制、课程的安排、修业期限等等，初步订立了制度。但那时各县多未立即实行办学。光绪二十九年又公布癸卯学制图。是年冬，宣布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，各省设立学务处，为推行新学的机构。

新会于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成立“新会合邑学务公所”，以推动办学。初时公所设在古冈义学（今人民医院后座），后来迁往陈侯祠（今三贤祠葵艺厂址）。学务公所设所长一人，委员若干人，由县知事任所长，以举人梁国士等为委员。清廷为鼓励人们读学堂就给予种种奖励：凡高小毕业奖给秀才，中学毕业奖给五贡等科举功名。但这只是那些有钱人家，热中功名，认为读几年书，就可以实得功名，比科举考试容易，才积极送子弟入学。而一般劳动人民，因

学费贵，使用多，负担不起，入学的就较少。

到了光绪三十二年冬（1907年），清廷通飭各省调查地方办学堂情况，劝人办学，劝人入学，便又设立劝学所，新会劝学所所长为梁国土。但这机关虽然奉令设立，当时却没有经费，自筹自给，他们筹款方法花样百出，例如：会城环溪庙，每年旧历四月二十二日，例演粤剧，一连几天，庆祝神旦。梁便凭着筹款兴学为名，大开赌馆，抽收赌捐，乘机发财。庙前还挂着“劝学所筹款处”的大招牌。当时有位举人莫剑秋因为这事，做了一首诗来讽刺梁某，诗云：

“劝学所长旧学博①，学博而令钻劝学。劝学无钱靠戏捐，戏捐依然靠赌博，大船峨峨横客楼②，环城庙前充赌头。博馆四十有二间，博馆每间百七银，一千元报效学费钱。一千外，归入厚皮袋③，博也厚也厚其皮，博也学也学何为？君不见，中庸择善首博学，劝学无成且劝博。”

这首诗曾传诵人口一时。我那时年尚少，知道他们内幕的事很少，但从这首诗也可了解清末时期，我县地方官绅所谓兴办学堂的积极行动的一面。

（二）

作为新会最初兴办的第一间学堂，却不是上述那些官绅办了起来的，而是由于几位考不上秀才的书生，在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创办求志学堂开其端，随后方有官立学堂之开设。

求志学堂创办人陈纪楼（同盟会员）、莫浣卿、李焕南三人，当求志学堂开办以前，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莫浣卿、李焕南两人已合馆设私塾在鱼生栏莫氏祖祠、陈纪楼自

已设私塾在濠桥街张氏祖祠。他们三人原是同学，平时意气相投，他们看到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，那些读书人，一旦侥幸考到功名，“即狐媚长官，鱼肉乡族”④。作威作福，营私舞弊，都感到憎恶，当清廷决定废科举，准民间兴办学堂以后，陈纪楼便约同莫、李两人组织学堂、兴办新学；仍以莫氏祖祠为堂址，用红纸写上“求志学堂”的名牌，陈当堂长，莫当监学，贴在门外，开始招收男生。光绪三十年春季，求志学堂正式开学。这就是新会最初成立的学堂。

（三）

莫氏祖祠有正祠、附祠各一间，求志学堂全部租用为堂舍。一入正祠门口，左边门楼房是会客厅，右边门楼房是教员办公室，经过一个大天井，就是头座，作为礼堂，礼堂后边，经过一个较小的天井，就是神龛（亦叫寝室），用作甲班课室，可容学生五十人。天井右边用竹壁（竹织的间壁）间为教员宿舍，左边廊为课室走道。

附祠只得神龛一座，除用竹壁间一长房做教员宿舍外，就是乙、丙班课室，课室前面是空地，有秋千、单杠各一，这就是学生课余锻炼身体的器材，学生上体操课都是在大天井内进行，课室置一些长台凳，每张可坐学生四人。这在当时和大馆或私塾相比，求知学堂可算是初步具有学堂的规模。

学堂办了一年以后，学生人数渐多，堂舍不敷，陈等三人认为有扩充之必要，仍由陈纪楼具名报请两广学务处请求拨给公地自费建筑堂舍（陈字保常，系会城五福里人，薄有家产）。后来奉准指拨大南门谷仓旧址及牛肚湾司衙左边一

部分烂地为建校之用（即今大南路汽车修理厂地址）。陈于是先将自己及其弟姐的田地变卖，得款五千元作为建筑费。由于当时牛肚湾司不肯迁出，只将谷仓旧址一部分先行兴建。但五千元仍不敷用，复由他的姑母大力帮助和昌源杉铺徐姓老板赠给部分木材。至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春，新校舍建筑完竣，便迁入新校，增招新生。

新校舍入门为天井，正面及两旁为天台，种有时花。正座两层楼房，楼上是藏书楼及阅报室，所藏的书多是经、史、子、集等旧书，及一些新书，如新民丛报、算术等，绝少儿童读物。楼下是礼堂，正中悬挂孔子立象挂图。礼堂后边是操场，左边是两层楼房，与藏书楼相联接；楼上是宿舍，楼下是甲班课室和食堂。侧边还有教员宿舍两间。过了一个天井，又有一座平房的大课室，可容学生七十多人。最后就是厨房、浴室、厕所。象这样规模的学堂，在新会当时可算是首屈一指了。

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春，牛肚湾司衙门所踞地方，被陈等争回，南仓旧地便全部归求志学堂使用。陈等于是又在前面扩建两层楼房一座，后面建有三层楼房一座，中间扩大操场面积，校舍规模更加宏伟可观。

（四）

在鱼生栏的时候，学生分甲、乙、丙三级，甲级作为高小，乙、丙作为初小。甲级设在正座，学生年龄比较大，有二十多岁。乙、丙两级设在附祠，最小的学生有八、九岁。全校学生约九十多人，教员除李焕南、莫浣卿、陈纪楼外，还先后聘有李淡愚、张惠吾担任甲级国文、经学、写字等科

日；乙、丙班由李焕南、莫浣卿负责；陈纪楼上课比较少。另外还有临时教员，如黄楚琴教唱歌，林灿予教初小笔算，何沃泉教体操。他们都是临时性的。到来上课半年或数月，一有别校聘用就离开了。当时对于本科教得不大好，和教员未能专职有关。

学生最感兴趣的就是每月举行考试一次，榜列成绩，名列十名内的学生，都分别给予奖金（最多奖银四毫）或文具，以示鼓励。因此，学生多肯用功。

在教学上，甲级学生注重作文、写字、算术；乙、丙级学生，注重读书、认字、唸书、默书、算术等。

（五）

1905年以后，清廷一再厘订学制。求志学堂也调整班级，把学生编为甲、乙两级，甲级是高等小学，四年毕业，乙级是初等小学，五年毕业。后来又改甲级三年，乙级四年。学生收费，甲级每年收二十四元，乙级也收十多元。学生最多时有一百二十人左右，少则有八九十人。因为学校有搭膳寄宿，不少学生来自四乡，有的来自别县（以台山为多），也有住在广州的本县人回来就学。

甲级科目有修身、经学（四书、五经），历史（中国史、世界史）、地理、写字、信札、算术、珠算、唱歌、图画、卫生、格致（即物理）、英文、体操、国语会话等。乙级科目和甲级差不多，也有经学、体操。由于学生增加，教员也增加，担任各科教员，各个时期不同。在初迁校的几年，人材颇盛，教文科多是举人、秀才，教算术科的有不少是留日学生。如体操教员何承武，是将弁学堂毕业也来教了

一个学期。那时学堂的声誉日高，有些具有学问一时找不到适当职业的人，都愿意来校义务上几小时课。记得有位陈鳧意老先生，因为长于《易经》，他也来校义务讲授一个时期，但许多学生都听不懂。

我那时爱术科，当时担任体操科以彭泽霖教得最好。也是会城人，日本体育学校毕业生。教学内容丰富，有哑铃、球杆、棍棒、柔软操、木枪、游戏等，按期教授。他到校后，添置不少体操器材，如单杠、浪桥、轩轻板、车大磨、木马、打足球等（足球到北门大较场练习）。由于他对各科都很熟练，人又活泼好动，学生对这些科目感觉新奇，因此，他很得到学生的爱戴。同时他又荐引了几个留日学生来堂任教，如宋以梅（梅县人）担任国语会话，朱乃正（台山人）担任唱歌，林卓南（鹤山人）担任格致课，还有博济毕业的余献之（博罗人）担任卫生课。宋朱两人任教时间较短，林余两人则较长。但格致和卫生两科，因实验仪器少，学生基础差，跟不上，许多学生听来都没有味道。

文科有两位教员是很受学生欢迎，一是林薰尧（鹤山人、举人），一是崔适书（南海、廪生曾任广府中学教员，因学校风潮关系，转来新会），林教本国史、东洋史。崔教西洋史、国文。林的态度谨严，崔则较为和气，加以口才流利，学生和他更为接近。这两位老师从不体罚学生，最严重也只罚企堂。那时学生上课，多不守规矩，崔来了以后却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。每当学生嘈乱的时候，他就停下来不讲书，叫学生们玩的可到外面玩，不喜欢上课的可以回家去，不要以为读书只是为了毕业功名，缴了学费就不必来上课。他也不疾言厉色，镇静地坐在课堂上，学生静下来他又再讲。由于他的态度诚恳严肃，学生也逐渐给他感化过来。他

的讲书方法，不是照书逐句讲述，而是先把书中大意讲清楚，再解释疑难字句，其余由学生自己读。例如讲历史，他先将史实讲了，再分析兴亡原因，学生听来津津有味，容易接受。崔还教学生读书贵精不贵多，书要读得熟才有用。学生在他的指导下进步很快。

在辛亥革命前，崔常借着讲历史，比较君主民主两种政体的优劣，向学生的幼小心灵灌输民主思想。他说：世界大势，君主国家一天天少，民主国家一天天多，这是历史趋势。他还说，俄国一定会强盛起来，中国在俄国强盛之后，也会强盛，说这是“地运”使然。他指的“地运”是什么，我们当时没有问清楚。有一次他特别出了题目，测验学生思想，声明不改卷，也不交还学生，题目是“君主、民主孰宜时势论”（原题记不清楚，大意如此），学生交了卷，他看过之后，便把它全部烧掉。又有一次陈朗周教学生读陶潜的《归去来辞》，李焕南问他为什么教这篇文章，他答是文辞好。李却说：把这种文章教学生，国家也将会亡了。我们在学堂读书几年，老师们虽没有倡言革命，但学生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下，也多同情革命。有一位老劲伯（南海人）是教地理的老师，辛亥革命时期，还当上民军统领。

宣统年间，每到学堂都有学生会（只是本校组织），教员不合学生心意的，常会掀起风潮来，赶走教员，因此，对学生过严、学生会反对；过宽，学生也不听话。学问不好也会被赶逐。这时当教员的确需有些实学而又要有管教的方法，才能站得住脚。求志学堂的师资算好，没有发生过这种风潮。

求志学堂高小毕业生第一届两人，第二届六人，后来才逐渐增多。当第二届毕业行礼时，毕业生个个都穿上秀才袍。

那时学堂的教员薪金，专任教员每月不过二三十元。但教员不少，学费收入似乎不能相抵。莫浣卿李焕南常说：“我们办学是亏本的”，究竟他们如何维持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宣统年间，新会知县林玉铭根据奖励办学章程，以陈纪楼毁家兴学，作育人材，呈学务处奉准奖给他五品同知衔。就是当时最大的报酬吧！

到了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左右，求志学堂因种种问题停办了，官产处便将校地召投，陈纪楼出资向官产处投承该地，将一部分校舍改建住宅三间，闸门口改称树德里，他自己住了两间，其余变卖。

附 注

①“学博”是对有功名人的尊称，梁国士举人出身，曾任惠州儒学。但这句对梁是反语。

②当时环溪庙做戏，河面上泊满紫洞艇。

③梁国士的儿子梁鸿渠，绰号厚皮渠，是一个赌商。厚皮装是同音借指。

④见《陈氏族谱》：陈保常撰《求志学校碑记》有云：“乃科举时代所谓莘莘学子，剽窃词章，滥弋科第，一旦幸进即狐媚长官，鱼肉乡族，威福自用，苞苴钻营，毫不知有羞耻事。”

（原载一九六四年《新会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二辑）

伍廷芳与廷芳义塾

李汉振 何卓坚

(一)

伍廷芳（1842—1922）字文爵，号秩庸，新会人。曾在英国得法学博士学位，人以博士称之。他的先代从六区大堂村徙居会城官来桥（黄家楼尾）。父荣彰，在南洋星加坡做小生意。廷芳出生于马六甲合都亚南，四岁随父返国，寓广州芳村。童年就读私塾，但不愿学习举子业。十四岁在香港圣保罗书院攻读英文、算学、物理。十九岁毕业后，任香港中等审判厅、巡理署译员。随后又与友人创办我国第一间日报——《中外新报》，以开通民智。为探求西方法理，三十三岁那年（1874年同治十三年）乃往英国留学，入林肯法律学院学习法科。毕业时，名列前茅，并应考英国大律师。后因奔父丧回国，在港执“大律师”业。越四年，港府嘉其能，提拔为巡理府负责人（相当地方审判厅长），并受聘为立法局议员。中国人得为外国大律师，旅香港同胞得为议员以至法官的，廷芳实开其先。

廷芳素有经世之志，眼见清廷积弱无能，不谙外事，丧权辱国，至为痛惜。时直隶总督李鸿章闻其名，聘为幕府，廷芳于是从1882年起，入鸿章幕府十余年，襄助鸿章办理洋务，并多次参与清政府的外交谈判，曾先后出任美国、秘

鲁、墨西哥、古巴等国公使。任满归国后，任商约大臣，驻上海与各国缔约，对裁厘加税，收回领事裁判权等都提出有益的建议。升为商部左侍郎，再晋升为外交右侍郎。当时与沈家本同任修律大臣，凡前清凌迟连坐刑讯等有乖人道之条文，都被淘汰，为中国刑法开创新篇章。廷芳久居京师，洞悉前清不足与有为，郁郁于心，于是称病居沪，提倡讲求卫生，延年益寿，会集友好，月开卫生会两次，又创设慎食卫生馆，专备素庖，以开风气。

辛亥革命时，由起义各省推廷芳为总代表，又以民军代表参加南北议和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，孙中山任命为司法总长。随后因政府移于北京，廷芳引退达五年之久。在此期间，他在上海寓所著有《延寿新法》十三章，时年已逾古稀。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后，请廷芳入京任外交总长，不数月，黎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，由廷芳兼代总理。后因黎元洪违背《约法》，竟然解散国会，廷芳愤然而去。参加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，被选为总裁并兼任外交总长、财政总长。1922年受孙中山命任广东省长。同年六月，因陈炯明叛变，廷芳感愤得病，终于广州公医院，年八十一岁。国葬于广州东郊一望岗。生一子名朝枢。

廷芳生平好学，政事之暇，手不释卷。对于卫生，尤为讲究。他六十岁前，体弱多病，延医服药，也不见效。于是“弃肉荤，甘素食，慎起居，吸清空”。二十年如一日，长期坚持，老病痊愈，体质增强。他以亲身经历，加以科学分析，著有《延寿新法》一书行世，计万余言。除总论外，分十三章：一、论人身之功用；二、论食物之所宜；三、论食之有法；四、论食之有时；五、论饮水；六、论睡时；七、论太阳之利益；八、论天气之宝贵；九、论人类之风气；

十、论衣服之适体；十一、论感触之关系；十二、论运动之裨益；十三、论烟酒之毒害。他尝言，苟能环境配合，持之以恒，人的寿命可活至二百岁云。而廷芳博士之死，盖属于感触而致疾的。

其夫人何妙龄女士，出自名门（家世籍贯未详）。笔者在廷芳义学教书时，曾获其指导，觉其学问渊博，为人忠厚，乐善好施，她不仅在家乡办有义学，在外地亦做了不少善事：曾捐巨资于香港九龙广华医院。港地医药费昂，一般市民不易到医院求诊，留医更不容易，贫苦亲友遇病，每恳帮助，她有求必应，亲写介绍信，使其获免费或半费治疗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她全家大小不穿日本布，不购日本货，同时热心赞助在香港抗日救亡团体。送赠大量药品、棉衣给回国的救护队，以示抗日决心。

廷芳博士本身家境并不富有，其读书一切费用，皆由何女士资助，对伍博士生平功业，亦诸多鼓励。何女士无所出，为娶一偏房，独生一子，名伍朝枢。朝枢有三男、五女，长男叫竞仁、次男叫庆培、三男叫继先，闻现多侨居美国。

其子朝枢，字梯云。幼承家教，为同盟会员。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士。辛亥革命后，历任湖北外交司长、众议院议员、北京大学教员、海军部编纂员、政事堂参议、外交部参议，巴黎和会广东政府代表，广东政府外交次长、外交部长、广州市长、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。一九三一年四十九岁，任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、驻美全权公使。

(二)

廷芳义塾，是伍廷芳生前在会城开办的。约于1913年开办，塾址设在深冲桥（今中心路）友竹伍公祠，专收贫苦失学儿童，免收学杂费用，并供给所有学习上需用的文具书籍，招收一班。1922年6月伍廷芳逝世时，廷芳义塾全体学生六十四人致送挽联云：

设义塾者十年，兴学育才，凡一般济济贫儿，教泽咸沾铭肺腑；

奠危局兮六载，心疲力瘁，任各界纷纷党派，宏规具在惜音容。

当年在义塾任教的主任，为伍廷芳的堂侄孙伍咏梅，教员先后有谭星石、陈德宸等人。廷芳逝世后不久停办。

至一九三五年又由其夫人何妙龄女士重新兴办，改称廷芳义学。将其会城官来桥祖屋改建二层以为校舍，是一所专供贫童攻读的完全小学。于二月开始招生，凡报名入学，必先了解其家庭确是贫困，才得取录。该校不收学杂费，还供给书籍、算盘、书包等物。那时私立学校收费很贵，公立较廉，但多要穿校服，着鞋袜，一般贫苦大众的子女，失学者众。何女士有见及此，故复办这校，自任校长，以解决部分失学儿童。

该校设有三大课室，开足六级，设有教导、训育、班主任等职，所有教师经考试后择优聘任，薪金比一般学校较高，年终双薪。并雇一女校工专事茶水、膳食，使学生、教师饮食有常。其时任教的有伍汉源、李汉振、苏业泉、何琼芳、梁其杲、伍汉锦、廖爱玉等，伍汉源、李汉振先后为教

导主任。教学着重质量，注重国文、算术、珠算、书法等科，使学生毕业后有能力升学的，也有些文化基础知识出来社会应世。校规很严，无故不得请假，必要请假者，须于回校时补课。个别后进生，每于寒暑假，派有专职教师辅导学生补习，使其赶上一般学生的学业水平。

教学方法：遵照何女士意见，禁用体罚，采取启发、鼓励的教学法，着重平时作业，发现问题及时指导。每学期规定小考二次、期考一次，成绩优秀的，给予实物奖。对于学生的品德教育和爱国思想教育很重视。教师经常对学生进行家访，学校与家庭密切联系，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品德情况，分别进行教育。还在校内由师生合编有抗日宣传黑板报，揭露日寇侵华罪行，和经常讲述孙中山、岳飞、洪秀全等英雄人物事迹以激发爱国思想。

该校由于办得有些成绩，每期招生，报名者众，有些富裕家庭的子弟也千方百计托人情入学，¹但由于学校规模小，招生人数有限，而且该校又是义学性质，校长规定贫苦学生要占百分之九十，不能滥收。

有一年春天，伍朝枢夫人及其长女艳庄和香港大学教授某女士一行五人，由港回校视察校务，特到平山学校参观借镜，认为该校办得不错，有计划准备今后把义学扩大，开足十多个班，扩建校舍，还在广州买铺多间为校产，大量招收贫童。惜于1938年3月日寇侵犯新会，该校因而停办。在会城沦陷期间，校舍与设备为歹徒抢光拆毁，该校就从此停办了。

新会县景堂图书馆概况

景堂图书馆供稿

侨乡新会，有一座由爱国华侨冯平山先生斥资兴办，其后由他哲嗣冯秉芬先生等积极支持，至今有56年历史，藏书近15万册，读者每天不下一千人次的公共图书馆——新会县景堂图书馆。

景堂图书馆创设之前，冯平山以少年失学，后来去暹罗、香港等地，从事商业，甚感自己的学识浅陋，无法展布自己的抱负。略有成就，乃办平山贫儿义塾，专收容失学儿童，免费施教。继续办理平山高小、木工学校，并资助广东高中附小。同时在伟大的“五四”运动影响下，见教育渐由学校推及社会，教育学者提倡教育社会化。乃图谋创办图书馆，并斥资港币六万元（港币略高于粤币双毫），于会城购地兴建，一九二二年四月破土动工。在兴建期间，冯氏还亲自先后到上海、南京等处参观考察各图书馆，以资借镜。经过精心筹划，到一九二六年六月才建成开放。并以其父“景堂”名字，以名斯馆。

景堂图书馆创设之后，冯平山对该馆大为称心。在他生前，每年必定抽闲回来视察一次，多所指示。除每年拨出一定的经常费之外，如国内有大部的丛书刊行，超出经常费之外，馆中人员有所请求添置时，冯氏就额外拨款，不以为费。

图书馆位于新会城中心点，馆舍为日字型，坐北向南，钢筋混凝土的楼房结构，占地面积1025平方尺。前后两大座，前座上下两层，后座上下三层，中间为水池、花园和回廊，后面还有小花园，环境幽静。

1929年初，冯平山先生为安放于图书馆内的父亲铜像，由港回邑亲行揭幕时，见图书馆开放以来，“虽然具规模”，但“基础不立，难期永久”。遂于同年“拨定现款5万元，为该馆基金，贮存于东亚银行，收取利息，以为经常费之用”。决意把图书馆永久办下去。

抗日战争爆发，1939年新会城沦陷，图书馆遭受浩劫，馆舍被踞为敌伪警察所，台凳家俱大部分被盗毁，幸而古籍及善本书事先运往香港储存，部分图书转移到新会敌后双水东凌冲、罗坑乡两地，租赁馆舍，得以继续开放。但规模已大大缩小，馆员由10多人减至2、3人。日军占领香港后，经费接济中断，才被迫于1943年暂停馆务，图书全部散失。抗战结束后，馆舍又为国民党县政府占住，几经交涉，直至1948年10月，才收回修缮复馆。

解放后，冯平山哲嗣冯秉芬先生等，一本热心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，继续予以积极支持，负责一切经费。图书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愈办愈好。可是，十年动乱的1966年9月，受极“左”路线的干扰，馆名被铲去，铜像被拆除，大部分书籍被禁封，造成恶劣影响。是年10月，冯氏遂将平山小学与景堂图书馆献给政府接办。从此，国家纳入建制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落实了侨务政策，1979年1月，恢复原馆名，把冯景堂先生铜像安放回原处。同年4月，与“平山小学”建校62周年纪念一道，举行景堂图书馆建馆54周年庆祝活动。冯秉芬先生伉俪及其家属和在国内外国旧馆